

文苑笔谈

精美的壁画 珍贵的案牍

李庆

到敦煌研修,巧遇一位画家朋友。他很讶异:来这里的除了游人,最吸引艺术家,我这样的法律人也会对敦煌感兴趣?我说那是你对敦煌的了解不全。敦煌并不仅有精美的壁画,也有珍贵的案牍。

我们相约一起游莫高窟,来了几十次的画家朋友对莫高窟如数家珍。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于前秦宣昭帝苻坚时期,后历经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西夏、元朝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伏志明先生在《千年莫高窟》一文中考证,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地名是三危山。《山海经》中有:“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在远古神话中,三只青鸟为西王母侍者,青鸟栖息地为三危山。晋代诗人陶渊明有诗描绘“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朝为王母使,暮宿三危山”。

敦煌成为正式的地名是在汉武帝时。东汉学者应劭在《汉书》中注释“敦”“煌”二字的意义:“敦,大也。煌,盛也”;唐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

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相传,僧人乐尊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另有一说为:佛教有言,修建佛洞功德无量,莫者,不可能、没有也,莫高窟的意思,就是说不必修建佛窟更高的功德了。

从公元4世纪开始,随着佛教东传与兴盛,敦煌连续开窟造像,千年不断,形成了中国佛教艺术的辉煌宝藏。敦煌莫高窟是我国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古典文化艺术宝库,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的故事,有些也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

我们在旅途中读到一则文字:“敦煌,这两个字在口腔中发声的时候,就有一种煌煌阔大的气息……从公元4世纪开始,敦煌的石窟陆陆续续开凿了一千年,然后,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突然沉寂,在历史中无声无息。直至20世纪初,借由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中外,成为世人心中的文化圣地。像撒一把钥匙,打开时空隧道,连接了过去与现在,也连接了古人与今人。”

敦煌文物的故事包括发现、隐瞒、盗窃、保护,跌宕起伏,读来令人思绪难平。敦煌文献中还有很多官方和私人文书。据说古代衙门把这些文书保存到一定期限后就作废了,但因为纸张珍贵,寺庙就用这些废弃文书的背面来抄写佛经,这些资料在今天格外珍贵。比如说P3964号文书《塑匠料赵僧子典儿契》,这是一份五代时期的契约文书,内容为塑匠赵僧子因为家中淹水,没有钱修理,只好把他的几典给亲家,然后写了一份签字画押、担保债权的契约。

赵晶先生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与唐代法典研究》一文中写道:敦煌、吐鲁番所出文献种类十分丰富,其中与法律相关者不在少数。所谓法律文献,从广义上来说,包括唐代律、令、格、式等法典类残卷、契约、告身、过所等公私文书以及部分案卷、判集。20世纪初,敦煌文献甫一亮相,其中的法典类残卷便引起学者注意。

律与律疏在唐代前期有过数次修订,敦煌、吐鲁番所出法律文献的意义之一,就是反映历次修律的部分变化。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说:这些信息大多反映了律与律疏在“判定”意义上的变化。《职制律·户婚律、既库律》残卷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展现了制度内容的变化。该卷所载“放奴婢为良”条为:“诸放奴婢为良,已给放书,而还压为贱者,徒二年。若压为部曲,又减一等。”其中,在某些文字的左列又以小字写出替换文句,因此修改后的条文为:“诸放部曲为良,已给放书,而还压为贱者,徒二年。若压为部曲,及放奴婢为良而而压为贱者,减各一等。即压为部曲、及放为部曲而而压为贱者,又减一等,各还正之。”这与传世本《唐律疏议》《宋刑统》的文字基本一致。

唐代的法律形式包括律、令、格、式、敕等,除了律借由《唐律疏议》而得以完整保留以外,其余法律形式皆已散佚,因此学界持之以恒地进行着复原唐令、辑佚唐式的努力,而敦煌、吐鲁番所出的令、格、式残卷,提供了许多未见于传世史籍的条文。

无论是法律形式、年代判断,还是据此讨论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制度内容的变化甚至文本的功能用途,这些法典类残卷依然存在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在期待新文献公布的同时,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仔细爬梳已出版的各类敦煌、吐鲁番文献,从中发现此前未定名或被误定名的残卷,由此增加赖以据为的文本实例。

契约法是民商法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民间社会交换的基本形式。李功国、韩雪梅在其所著《敦煌法律文献中的契约文书》中认为,隋唐时期,民事上的契约关系迅速发展,并通过买卖、借贷、租赁、租佃、质典、雇佣、储存、运输、代理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契约成为民间交往交换和商品贸易的主要形式,因债务和契约纠纷而发生的民事诉讼也日趋繁复,以上诸多情形在敦煌法律文书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我熟知的还有沙知先生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一书,共计收集契约资料三百余件,分为买卖、借贷、雇佣、租佃、质典等类;另外,尚有吐鲁番出土的契约数百件,数量之多为全国罕见。如有闲暇,研读这些文书,也一定会有丰厚的收获。



敦煌壁画《九色鹿王》(局部),莫高窟第257窟,北魏时期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和执政理论,决定了文艺的“人民性”始终是中国文艺思想体系的基本纲领。

近年来,以新时代检察工作为题材的影视文艺作品不断涌现,从《人民检察官》《人民的名义》《因法之名》《决胜法庭》《巡回检察组》《你好,检察官》《公诉》等电视剧热播,到《检察长》《馨海蝶》《无法证明》《青春检察官》《黑金危机》《无罪》《我们是检察官》《伪证》《检察风云》等电影上映,这些检察题材的影视文艺作品不断涌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艺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高扬人民性的文艺道路中阐述检察工作的时代之变,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筑牢信仰之基。

走进实践深处,观照现实生活

不同于一般影视作品,检察机关的政治属性和检察工作的专业性对从事检察题材创作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为视角,描绘新时代法治进程中普罗大众的现实生活?如何跳出“身边的小小的悲欢”,描绘“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的每一个具体的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深入生活、深入司法实践,才能最大限度还原在场感,减少疏离感。

作家周梅森在接受采访时说,为了创作《人民的名义》,“……我去了南京的浦口监狱,与一些落马官员、检察院及驻监检察院所的干部开了几个小型座谈会”。编剧赵冬苓在创作《因法之名》之初,也曾多次深入检察官生活,与检察业务部门座谈,对办案检察官进行采访,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历时4个月才完成了12万字的故事大纲。走进检察机关、走进案件卷宗、走进案发现场,面对一页页卷宗、一桩桩案件,通过采访采风的方式,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活在文艺工作者面前敞开,从“幕后”走到“台前”,呈现出不同样态的不同群体。

纵观检察影视作品,以公平正义这一视角对剧中角色可划分为三类群体。一是公平正义的寻求者,这类群体主要聚焦于因受到不公遭遇而努力寻求公平、期待正义的普通群众。《人民的名义》中因官商勾结导致员工股权利益受损,大风厂工人群体以奋力护厂来对抗不公,维护自身权益。《因法之名》中通过许志逸杀妻案得以平反,展现了冤案背后十七年来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生存境况。《无罪》通过对张氏叔侄在监狱内从坚持申诉到放弃生命再到重拾信心的讲述,展现了平凡人在寻求公正这条路上的心路历程。

二是公平正义的维护者,这类群体的塑造主要是以检察官、法官、警察、律师等角色为主。《检察风云》中,在杂乱线索中抽丝剥茧寻找真相的检察官李睿,为了保护证据不顾个人安危的检察官张有成,他们从强奸案、故意杀人案一步步能动履职,在正与邪的较量中维护公平正义。《人民检察官》中反贪局局长方大庆和公诉处处长夏静茹,不仅有着过硬的专业

影评

小角色的喜乐人生

罗兴美

功?什么才是我们向往的生活?我们追求功名又是为了什么?

剧中的鹏少难道不成功吗?他从事的是自己热爱的工作,他过的是自己喜欢的生活,他每天都在享受工作,也在享受生活。我们追求的稳定、成就感他都有,他的成就感不需要外界施舍,他攻克的每一个难题都会默默地给他巨大的成就感,他不需要掌声,就像一棵树开花结果并不是因为有人赞扬,而是听从内在节律的召唤。必须勇敢承认,我非常羡慕鹏少,却放不下身上的枷锁去成为他那样的人。挣扎的最终,我们也许发现自己既成不了想要的自己,也成不了羡慕的他人;我们混入人流中,一边抱怨拥挤沉闷,一边亦步亦趋不愿离开人群。

大人物有大人物的波澜壮阔,



《人民的名义》

陈曦



《检察风云》



《你好,检察官》



《我是检察官》



《巡回检察组》

诉了结生命,但他不离不弃。

2019年4月首播的电视剧《因法之名》中每天去检察院申诉的刘成老岑,因在文革时被判强奸罪坐了一年牢,可是“那件事不是我干的”一直让他坚持了四十年,或许对别人来说毫无价值,但是对他来说清白就是尊严,就是他的生命,他从未放弃过对公正的追求,

他要以“看得见的方式”为自己证明,最后在检察官和律师的帮助下,法院为他破例举办了一场宣判无罪的仪式,“因法之名,依法改判,还刘成清白”。此刻,声音回荡在法庭,公平正义被看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打虎”“拍蝇”“猎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民的名义》带着时代的烙印应运而生,通过塑造一系列角色丰满的人物形象,反思官员走上贪污腐败道路背后的深层原因,避免了脸谱化、扁平化的倾向,从而更具有现实性和警示性。别墅里私藏2.3亿人民币却在破旧居民楼里吃着一碗简单面条的国家部委某司项目处处长,英雄出身却在胜天半子的执念中将权力异化成自己工具的祁同伟,他们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就是在面对权力带来的巨大诱惑时,从本应为人民谋幸福,到只为自己谋利益。理想信念的崩塌,个人私欲的放纵,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损害了人民利益,侵蚀了党的肌体。同样,在《检察长》和《黑金危机》等影视作品中也深刻诠释了惩治贪腐的生动实践。

2020年12月首播的《巡回检察组》是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背景,在巡回检察组重启“九三零杀人案”过程中,随着检察官冯森调查的深入,挖掘出黄四海杀人案、检察官罗欣然被追杀等多起恶性犯罪事件,在武强、冼友文等人相继被查后,以黄雨虹为首的新型黑恶势力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检察机关通过打伞破网、打财断血真正做到了“是黑恶犯罪一个也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也不凑数”。

2021年4月上映的电影《伪证》,将目光投向农村的黑恶势力,村头恶霸张德福为了掩盖儿子张金龙的杀人真相,倚仗自身权势,通过威逼利诱、恐吓威胁等手段迫使21名村民为其子作伪证,严重干扰司法公正、破坏司法秩序,办案检察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村庄,通过调查走访,最终固定证据,将罪犯送上审判台。

繁荣法治文化,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要求“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需要”。作为法治文艺重要题材之一,检察题材的文艺作品在弘扬法治精神、坚定法治信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全社会营造崇尚法治的文化氛围贡献检察文艺力量。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人法标志着其不再仅仅是一种法律理念,

更是一种法律规则。电视剧《因法之名》取材于真实案件,以许志逸杀妻案的侦破、起诉、审判、申诉、复查、再审为主线,从两代法律人的时间跨度入手,再现了疑罪从无在中国法治进程中从“纸面上的法律”到“行动中的法律”的转变过程,作品通过直面法治进程中的不足,正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在勇于揭露不完美中彰显整个社会法治意识的提升。

以检察官邹雄、警察葛大杰为代表的老一代法律工作者,或许是因追捕过程中牺牲的队友,或许是因为求10天破案的沉重,或许是因为被隐藏起来的两枚指纹,或许是因为一切实验都指向了许志逸,他们忽略了对案发现场进一步深入的调查,导致他们在证据薄弱的情下将许志逸缉拿归案。在法治不断完善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青年检察官邹桐、青年警察仇曙光、青年律师陈硕等新一代法律工作者,秉持着疑罪从无的法治原则,合力将十七年的冤案平反。在冤案背后,折射出有罪推定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巨大伤害,同时也映射出无罪推定历史选择的正确性与必要性。

当历史的一角被翻开,尘封的真相被揭开,历史的错误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人的行为,囿于时代的局限和根深蒂固的思想,如何预防和避免冤假错案这一世界性司法难题,中国的法治进程从过去走向未来,前进的步伐从未停止。

法者,天下之理也。在现代法哲学的理论体系之中,“理性”并不仅仅意味着法治要合乎认知理性,更重要的是合乎道德理性、价值理性;法治不仅要合乎真理,还要合乎情理;不仅要合乎私理、私人理性,更要合乎公理、公共理性(张文显《法治的文化内涵——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这也就意味着法治要实现三个层面的理性,即法治与德治结合、法治与情理结合、法治与公理结合,这才是现代法治精神的体现。电视剧《巡回检察组》最后一集,在冯森提审米振东时,在一个叙事空间中,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激烈碰撞中,闪耀着现代法治精神之光。

米振东是一位只关注私人情感的非理性典型代表,他信奉且崇拜春秋战国时期的豫让,一直活在自己建构的侠义世界之中。当养父母不幸离世,他燃起复仇的火种,必须要替天行道惩恶扬善。然而他世界中善与恶的标准,却是由自己的主观感受进行界定的,就这样在非理性支配下,他策划了多起案件,让无辜的受害者成为他实现私人理性的工具。检察官冯森是现代法治精神的典型代表,他以现代回望古代,豫让的故事被重新阐释,击碎了米振东穷极一生苦苦垒筑起的侠义世界。当冯森掷地有声地说:“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现代法治之光驱散阴霾,照亮了每一位因遭遇不公而内心曾经黑暗过自己,也照亮了从古至今从人治到法治的人间大道。

现代法治精神是检察题材影视作品人民性审美特征的崇高境界,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的灵魂所在。面对人民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检察机关要继续在依法办案中弘扬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继续在能动履职中引领社会法治观念的养成,继续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担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以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为谱写法治中国建设新篇章贡献更多精彩的检察故事。

层住往是最焦虑、最抑郁的群体,他们把自身的不安投射在孩子身上,催生了大量的抑郁症青少年。这些大人、孩子都偏离了自己的热爱,或者说找不到自己的热爱,因此感到疲惫、压迫、无奈。

英雄固然值得崇拜,但普通大众也应该歌颂,他们才是生活的孤勇者,谁说污泥满身的不英雄。最伟大、最强劲的力量永远在底层人民群众中,正如路遥在《人生》中塑造的主人公,他一心想逃离土地,逃离乡村,然而当一个人一无所有的时候,土地和家乡人民会宽厚地接纳他的一切。平凡人就像一棵平凡的野花、野草,即便无人问津,即便酷暑严寒,只要春雨来临,就会迸发出顽强的生命力,其坚韧与隐忍让人叹服。

当年明月将徐霞客放在了《明朝那些事儿》的最后一章,作为整本书的压轴,他认为徐霞客才是最成功的人,谁说不是呢?有一种大成就就是能够追随自己的内心去往自己喜欢地方和位置,正如影片中的鹏少要去当图书管理员,那是无数人偷偷羡慕的人生。